

蓬勃与多元：20世纪以来《罗摩衍那》在中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

张 帅 马 睿

摘要：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自吐蕃时期传入中国藏区后，在悠久绵长的千年历史中扎根藏地，逐步成为藏族人民耳熟能详的外国经典故事。中国藏区的罗摩故事形态受到印度和藏区本土的历史语境、文化氛围、宗教传播及译介主体等多种现实因素的限制与影响。长期以来，由于《罗摩衍那》的印度教文本属性与藏区的藏传佛教信仰，藏族学者的文学接受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过滤与变异现象。20世纪初，《罗摩衍那》的藏译与接受现象迎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变迁。藏族学者筚路蓝缕，抛弃了狭隘的宗教派别偏见，力求探索真知，开创了《罗摩衍那》在藏区译介与接受史的系统化、全面化和多元化局面，呈现出全新的文学景观。以根敦群培为代表的藏族学者开始跳脱佛教神学观念藩篱，以人文史观与实证考察的学术方法开启对《罗摩衍那》的评判与研究。这与当时藏族学者学术价值观念的剧变紧密相连。此外，罗摩故事与藏戏表演艺术的密切结合使其根植于民间口头叙事传统，纷繁多样的藏戏流派因地制宜，基于地方性知识与各自独特的表演模式进行阐释，衍生出丰富各异的罗摩故事样态，进一步强化了藏族群众对这一古老外来题材的文化认知。可见，印度罗摩故事已深入当代藏族本土语境，成为藏族民众喜闻乐见、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

关键词：《罗摩衍那》；中国藏区；译介；接受；印度文学

收稿日期：2020-12-31

作者简介：张帅（1996~），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中印文学关系与藏族文学；马睿（1989~），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讲师，主要研究领域：近代藏族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涉藏对外传播战略视野下中美印关系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CGJ017）的阶段性成果。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是印度人民集体创造的宝贵文化财富，承载着印度各民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记忆。这部大史诗在印度国内家喻户晓，与《摩诃婆罗

多》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不仅代表着印度史诗文学的艺术巅峰，同时对印度宗教信仰、民俗节日、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社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罗摩衍那》被广泛译介到世界各地，与各国本土文学传统融合，形成了多路径、多维度、多层面的罗摩故事形态谱系，在中国藏区的译介与流布也自成一传播系统。敦煌古藏文译本堪称是《罗摩衍那》传播史上最早的藏文译本，开启了《罗摩衍那》在藏族经典文献中丰富多元的文学话语空间。敦煌古译本《罗摩衍那》、长篇叙事诗《罗摩衍那》、根敦群培《新译罗摩衍那》和藏文全译本《罗摩衍那》构成了一条横跨千年的藏区译介脉络。^①毫不夸张地说，《罗摩衍那》在中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史就是一幅中印两大文明体文化交流与沟通的缩略景观图。目前，国内学界在《罗摩衍那》的藏译史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②但研究对象多集中于20世纪前的具体文本，如敦煌古译本《罗摩衍那》，对这部大史诗在20世纪后中国藏区的译介情况与接受境遇关注较少。系统钩沉历史细节，探索20世纪以降藏族学者如何认知与评价这一古老史诗，分析20世纪前后这一文学传播中发生的重大历史转变以及潜藏在这一文学表征下的文化内涵，以外部实证性材料加以佐证考据，勾勒还原出藏译《罗摩衍那》的整体文学图景，能为当下中印文化友好交流事业提供重要启示与宝贵经验。

一、20世纪以来《罗摩衍那》在藏区的译介情况

（一）根敦群培《新译罗摩衍那》

《新译罗摩衍那》是藏族传奇高僧学者根敦群培^③游历南亚诸国时，根据地梵文本所译，故事情节完整，语言朴实凝练。该译本前80页由根敦群培翻译，剩余部分由弟子热拉智通参照梵文精校本《后篇》第48~110回进行续译，后结集成册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据热拉智通所撰前言交代，根敦群培翻译的梵文参照本已无法查明。^④

^① 为便于论述，后文统称为敦煌古译本、叙事诗、新译本和全译本。

^② 此类研究成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版本研究类成果，如仁欠卓玛《藏族传统修辞理论〈诗镜〉中的罗摩故事研究》以及《〈萨迦格言〉及注疏中的“罗摩”故事分析》，分别考察了《诗镜》《萨迦格言》及注疏中的罗摩故事；另一类可看作文本传播类成果，如多布旦《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藏文文献价值与研究综述》以及仁欠卓玛《探析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藏族传统文学中的价值》，从整体宏观层面阐述罗摩故事在藏族传统经典中的价值意义。

^③ 根敦群培（1905~1951年），20世纪藏族爱国主义高僧学者、启蒙思想家，西藏人文主义思潮和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自1934至1946年12年间游学南亚，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翻译有大量著作，在藏族语言、文化、历史、宗教、考古、绘画等诸多领域造诣高深，论著颇丰，堪称现代藏族学术大师。

^④ 根敦群培、热拉智通译：《新译罗摩衍那》（藏文），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该译本分为八篇，分别为《上师篇》《青年篇》《阿逾陀篇》《森林篇》《猴国篇》《楞伽篇》《战斗篇》《后篇》。与季羨林汉译本^①相比，该译本多出《上师篇》，此篇主要交代罗刹王的出生、罗刹王祈求不死恩典、罗刹王占领楞伽岛和哈努曼出生等故事情节，与汉译本《后篇》内容出现大量重合。

新译本的故事框架与梵文精校本情节发展脉络一致，但与其他版本相比存在显著差异。首先，罗刹王供养梵天获得不死恩典和受到诅咒等情节有所出入。该版本中罗刹王三兄弟以苦行供养梵天，将头颅依次砍下以作供养，在将要砍下第十首时，梵天心生怜悯，前往满足了他不死的心愿。这与汉译本情节完全一致，而与以往藏区通行的“罗刹王供养大自在天无法如愿”情节有所出入。此外，罗刹王受到诅咒情节也有所变化。该版本中的罗刹王得到恩典后四处滋事，曾托起雪山，静修仙人无不惊恐，毗湿奴诅咒他将被人类和猴子毁灭。汉译本中罗刹王先后受到三次诅咒，分别为：罗刹王看到湿婆化身猕猴相发出狂笑而受到罗刹家族将被猕猴毁灭的诅咒、罗刹王骚扰苦行仙人之女吠陀婆底而受到将被女性悉多毁灭的诅咒、罗刹王挑衅阿逾陀国王而受到被甘蔗族后裔毁灭的诅咒。^②诅咒情节在藏区以往通传版本中则表现为罗刹王因歧视女性与猴子而不愿从乌玛天妃和神猴中获得恩典，因此受到将被女性和猴子所毁灭的诅咒。

其次，悉多的身世命运呈现出明显差异。该译本中，罗刹王向静修仙人索取赋税，仙人一无所有只能献血，魔王将血液放入仓库，一年竟未损坏，罗刹王妃建议放入金盒随河流漂走，农民在弥萨罗国的水渠中发现认为其不祥，遂埋入地下，遮那竭国王按照祭祀仪轨耕地时发现了盒中女婴，遂带回宫中抚养，取名为悉多。汉译本只交代了国王发现悉多并带回王宫抚育的情节。在藏区以往的罗摩故事中，悉多都被认为是罗刹王之女，罗刹王妃生育后视作不详将其放入铜盒弃于河流，后被农夫收养献于罗摩。在悉多的命运结局方面，根敦群培所译部分在罗什曼那按照罗摩命令将悉多遗弃至静修林处戛然而止，后热拉智通根据梵文精校本进行续译。据前言介绍，该译本内容完整，尤其体现在“罗摩救回悉多后因惧怕百姓谣言将悉多遗弃，悉多生育双生子后经蚁蹉仙人介绍，夫妻重修于好，返回王宫”，^③但从情节判断并非如此：蚁蹉仙人在罗摩举行马祀仪式上将悉多

^① 在 20 世纪，印度梵语文学界组织校订编写梵文本《罗摩衍那》，以便于史诗研究。印度巴罗达东方研究所陆续出版了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1960~1975 年），我国学者季羨林先生据此翻译出中文版《罗摩衍那》（1973~1983 年），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成为我国首个情节完整、结构全面、规模宏大的《罗摩衍那》全译本。本文所述汉译本均指该版本。

^② 参见季羨林：《季羨林全集（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6、125、138 页。

^③ 根敦群培、热拉智通译：《新译罗摩衍那》（藏文），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带来并力证其清白，悉多回归地母怀抱，罗摩将王位传给双生子回归天界，这与汉译本结局完全一致。在藏区以往版本中，罗摩救回悉多后返回都城继承王位，团聚美满，罗摩质疑悉多贞洁的情节完全消失不见。

再次，根敦群培以夹叙夹议的行文方式在译本中引用了大量实地考察成果，使该译本明显区别于以往版本而具备全新的学术价值，反映出他在《罗摩衍那》译介和研究中的学术观念已发生转变。根敦群培在游历南亚诸国时，积累了大量《罗摩衍那》的相关实证性调研资料，并在翻译中加以运用说明。如他在旅行札记中写道：“印度人认识新朋友时会念诵‘罗摩罗摩’，脚尖被石头绊住也会念诵‘罗摩罗摩’，在每月中旬和月末晚上会聚集在神庙，用乐器伴奏，唱诵罗摩故事通宵达旦。”^①这表明他从旁观游历者的角度亲眼见证了《罗摩衍那》在印度本土传播已深入民间信仰层面。此外，根敦群培在谈及印度教神灵时列举出罗摩与黑天崇拜在印度的信仰情况，并指出罗摩信仰更为广泛，同时对猴军渡海所建石桥的历史真实性进行了实证考究，并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绘制桥梁地图以说明其地理位置。^②南亚次大陆与斯里兰卡岛屿间的海底丘陵相传为《罗摩衍那》中猴军建桥留下的遗迹。对此说法，他认为不应将神奇的传说故事与历史混为一谈，他在新译本中加以罗列与阐述，认为部分传说符合历史记载，具有一定历史真实性，应当批判性地加以选择接受，这反映了他在治学中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根敦群培不仅熟读罗摩故事，并且在游学中有意识地搜集文献资料加以翻译研究。他以不偏不倚、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客观公正地评判印度民间的罗摩传说，突破了长期以来藏族学者无法跨越的神学思维藩篱与宗教隔阂。

与以往译本相比，新译本将史诗情节、人物称谓、地点名称几乎全部译出，内容情节周详全面，大量的梵文借词显示出译者扎实深厚的梵文功底。同时，新译本主干故事框架中插叙的印度神话以及部分情节与梵文精校本出现高度重合，如梵天创造世界、甘蔗族十车王的王族世系、毗湿奴受到仙人诅咒与妻子分离^③等，说明根敦群培所参照底本与梵文精校本存在密切渊源关系。

^① 根敦群培：《根敦群培著作（第一集）》（藏文），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② 根敦群培所述石桥实为罗摩桥（Rama's Bridge），位于保克海峡，由一连串石灰岩礁石和沙砾连接而成，将南亚次大陆与斯里兰卡连接起来。印度民间认为该桥是史诗《罗摩衍那》中罗摩与猴军为解救悉多所修建桥梁的历史遗迹，印度教徒将此视为宗教圣地深信不疑。2002年，美国宇航局发布的卫星照片将罗摩桥的真实构造公之于众，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社会争论。而根敦群培对罗摩桥的考察与研判比前者足足早了近60年，足见其研究《罗摩衍那》的开创性与前瞻性。手绘地图参见根敦群培：《根敦群培著作》（第一集，藏文），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③ “从前天神打败阿修罗，阿修罗向一位仙人的妻子寻求帮助，仙人妻子答应提供庇护，毗湿奴知道后震怒之余砍下了她的头颅，仙人因此诅咒毗湿奴下凡转生为人后，将会遭受和妻子长期分离的痛苦。”参见根敦群培、热拉智通译：《新译罗摩衍那》（藏文），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自敦煌古译本至新译本的千年历史间，罗摩故事以丰富多样的文学面貌出现在藏族民众的阅读视野中，更凭借藏族学者伟大的创造才完成了本土化演进，逐渐跻身藏族文学史行列。20世纪初，《罗摩衍那》的史诗文本体系在印度国内发展已日臻完善，各地版本纷繁各异。新译本全面完整地译介了其主干情节及故事背景，在忠实梵文原本的详尽程度上，藏区以往的罗摩故事均无法与之同日而语。此前藏族学者普遍以运用和注解罗摩故事为主，局限于复述与改造的文学创作层面，而新译本首次以“翻译加研究”的行文方式呈现，揭巢出《罗摩衍那》对藏族文学的价值意义，体现出藏族学者前所未有的探索与考究意识。

（二）藏文全译本《罗摩衍那》

除新译本外，当代藏族学者敖见所译《罗摩衍那》也意义重大，打破了藏文全译本长久缺失的尴尬局面。敦煌古译本是目前发现最古老的《罗摩衍那》藏文译本，但由于《罗摩衍那》属于印度教经典，历史上藏族学者积极引介罗摩故事的同时从未有结构完整、不作丝毫删改的译本出现。因此，尽管《罗摩衍那》早期率先在中国藏区流传，但藏文全译本的长期缺席不免令人抱憾。

2008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敖见所译的藏译本《罗摩衍那少年篇》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罗摩衍那》首次被完整译为藏文。敖见参照了根敦群培译本和梵文底本，如季羨林汉译本出现的人名、地名等特殊名词都从梵文原文直译而来，通过拉丁转写进行注音，模仿传统诗歌创作风格，使用修饰词藻，但不拘泥于旧词古语，而以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理解方式为导向。对于史诗中的主要人物名称，早在藏区以往的罗摩故事中已有固定的翻译方式，因此译者依旧遵照古译方法，不加改动。截至2018年，七卷八本的藏文全译本已陆续出版面世。藏文全译本的出版是《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走向全面与系统化的标志，在中印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20世纪以来《罗摩衍那》在藏区的接受情况

（一）端智嘉《罗摩衍那》译作与论述

继根敦群培之后，藏族学者端智嘉^①也留下了大量《罗摩衍那》翻译评述资料。他不仅以诗歌和散文形式对罗摩故事进行再创作，还对敦煌古译本和叙事诗版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梳理诗歌中的修饰方法，提出了诸多辩伪发覆、颇有见地的学术见解，其相关论著收录于《端智嘉全集》，主要包括《罗摩衍那·青春之歌》《散文体罗摩衍那》《罗摩衍那新释》《罗摩衍那词句释难》《通俗解

^① 端智嘉（1953～1985年），当代藏族著名学者，著有大量诗词、小说、散文、译作和学术论文，20世纪80年代风靡藏族文坛。90年代，藏族学者将他的遗作整理汇集出版，合称《端智嘉全集》（全六卷）。

释敦煌本罗摩衍那》。

1. 《罗摩衍那·青春之歌》

《罗摩衍那·青春之歌》是端智嘉以诗体形式对《罗摩衍那》的改写和创作，与叙事诗《罗摩衍那》风格类似，收录于《端智嘉全集》第一卷《诗歌集》中。

该诗作主要分为研究综述与译文两部分。综述部分是端智嘉对《罗摩衍那》的研究成果，主要归纳总结《罗摩衍那》流传世界各国的历史，介绍印度两大史诗产生的发展过程，认为史诗经历了从民间口传到知识阶层修订编纂逐渐成文的发展过程。他考察了史诗的真实作者，认为从史诗情节及史诗风格前后出现矛盾来看，史诗不会出自一人之手；从象雄·曲旺扎巴^①将《罗摩衍那》讽刺为外道传说故事分析，端智嘉认为可确认蚁趺仙人是根据《摩诃婆罗多》插话《罗摩传》进行再创作的；概述《罗摩衍那》故事情节，即毗湿奴化身罗摩打败罗刹王的故事，同时对印度国内出版的三个梵文版本进行评介；探讨《罗摩衍那》在印度本土的流传情况，认为史诗反映了古印度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纷争，成为印度不同时期各教派创作的文学素材；介绍《罗摩衍那》在我国西藏的译介情况，指出自赤松德赞到赤德松赞时期（742年至815年）存在不止一种译本，在朗达玛灭佛时期（842年）流散遗失，并列举了部分引用罗摩故事的藏族经典论著。

译文部分由端智嘉用诗体语言进行再创作而成。从诗歌情节看，该诗应当是根据叙事诗改编的通俗版本，情节内容一致，但剔除了大量繁复冗杂的辞藻，以通俗易懂的诗歌语言进行创作，由学者年·洛珠坚赞撰写前言，并附有《罗摩衍那》创作手稿。他高度赞扬端智嘉的诗歌造诣，并称赞“端智嘉创作的《罗摩衍那·青春之歌》更胜于象雄·曲旺扎巴”。^②

2. 《散文体罗摩衍那》

除诗歌创作外，端智嘉还译有《散文体罗摩衍那》，但只翻译了“悉多的婚礼”这一章节，收录于第四卷《译作集》中。从情节内容判断，这与汉译本《童年篇》第66至72章基本一致，即罗摩拉断神弓迎娶悉多的故事情节，但删去了悉多身世以及罗摩兄弟幼年协助仙人降服扰乱修行的罗刹这两部分。在语言艺术上，译作散韵结合，行文生动平实，用语通俗易懂，无梵文借词与藻饰词。

^① 象雄·曲旺扎巴（1404~146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侣，他于1438年在格鲁派祖寺甘丹寺改写新创了长篇叙事诗《罗摩衍那》，全称为《罗摩衍那之可技乐仙女多弦妙音》，据说是为了驳斥藏传佛教其他教派讥讽格鲁派不善诗歌创作的观点。

^② 端智嘉：《端智嘉全集·诗歌集》（第1卷，藏文），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3. 《罗摩衍那新释》

《罗摩衍那新释》是端智嘉研究叙事诗《罗摩衍那》的学术成果，收录于第五卷《名作诠释集》中，但并未完成。该论文主要是摘取部分象氏的诗歌原文进行阐发，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妙音天女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以及妙音天女的产生历史作追本溯源式探析。端智嘉指出，印度教神话传说认为，梵天爱听微风吹拂南方海洋发出的悦耳声音，于是这些声音就化成了妙音天女。印度学者形成了凡创作必先赞颂顶礼妙音天女的文学传统，如檀丁在《诗镜》开头就仪式性地颂扬妙音天女以求创作顺利，语言优美。佛教则认为妙音天女是从观世音的牙齿中生出的。据《宝篋经》记载，观世音菩萨为了消除世间的五浊，拔下一枚牙齿放入海中幻化出妙音天女以普度众生，而藏传佛教密宗将她看作是文殊菩萨的佛母。

第二，考察史诗中涉及的地理位置。端智嘉从《所知藏》《宗教史·奇异大海》和《贤者喜宴》等佛教经典对“拂尘洲”这一地理概念进行了溯源式考证，认为该地长期为罗刹占据，实际是今日斯里兰卡，同时也提到了猴军建造的石桥，传说“乘坐竹筏需要绕行，如今还能清晰看到海底的红色石头，传言是罗刹王被罗摩射杀时染红的”，^①这印证了根敦群培实地考察的结果。端智嘉还指出，敦煌古译本《罗摩衍那》对斯里兰卡自然风光和地理风貌的描写几乎与现实环境完全相符。

4. 《罗摩衍那词句释难》

《罗摩衍那词句释难》是对象氏叙事诗《罗摩衍那》疑难术语进行的释意，主要包括辞藻、梵语词、佛教术语以及原文出现的特殊人名、地名和神祇名称等，收录于第五卷《名作诠释集》中。端智嘉引用了大量的藏族经典著作及译著以作疏证，如《智者耳饰》《甘露藏》和《语词藏》等，涉及大量印度神话传说。作为印度教经典，《罗摩衍那》在文本传播中会因文化氛围的异质性分野而产生意义变化，印度教与藏传佛教部分仪轨、神灵乃至教义的相似更易导致误读。他指出，藏族读者在阅读时应从印度教的文化语境理解文本，比如印度教与佛教在火供仪轨中的供奉对象和供品都有所区别，阅读时应注意甄别，凡出现之处悉以印度教火供理解。^②

5. 《通俗解释敦煌本罗摩衍那》

《通俗解释敦煌本罗摩衍那》是端智嘉对敦煌古译本《罗摩衍那》的研究成果，收录于第六卷《散文书信》中。该作主要对古译本情节进行了简要概述，

^① 端智嘉：《端智嘉全集（第5卷）：名作诠释集》（藏文），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

^② 同上，第330页。

特”^①藏戏剧目，如《松赞干布》（1946）、《达巴丹保》（1955）、《卓娃桑姆》（1956）、《冉玛拉》（1960）以及《阿达拉姆》（1962）等，并在大型宗教节日集会上演出。

藏戏《冉玛拉》全称为《罗摩衍那之戏剧修辞技乐琵琶弦妙音》，由叙事诗版本改编而来。全文由颂词和正文组成，在颂词部分作者向妙音天女、文殊菩萨和原作者象氏顶礼赞颂。从剧本情节看，该剧本基本遵照原本情节，只删除了部分细节，如罗刹王供养大天、悉多身世等情节。据史料记载，琅仓活佛十分钟爱京剧艺术，“先后看过梅兰芳、马连良等著名艺术家演出的许多传统京剧剧目，并与梅兰芳等有过交往，对京剧较为熟悉”。^②后来琅仓活佛在自创藏戏剧目时也吸纳了大量京剧表演元素。因此，“南木特”藏戏剧本《热玛纳》是在印度故事藏戏化的基础上融入京剧文化形成的戏剧精品，承载着汉藏文化合璧的艺术精髓。

该剧本以藏族传统的散韵结合体进行叙述，正文指出剧本按照《诗镜》理论进行创作，唱词部分以韵文为主，散文用以叙述情节发展，可见该剧本作为典型的宗教戏剧，严格秉承了原作版本以及《诗镜》的诗歌创作规范，在优美庄严的诗歌中灌注佛教义理，以达到教化信众的宗教目的。该剧主要讲述王子与邻国公主相爱受阻，同经过训练的猴军结盟打败敌人的故事。^③

宗教戏剧在赋予观众强烈的审美愉悦体验中传播宗教教义，观众能在身临其境的观赏中感受到宗教的熏陶与净化。有学者认为，罗摩与魔王罗波那大战的情节蕴含着丰富的大乘中观思想，即罗摩以箭射杀罗波那头颅，“不偏不离取得大

① “南木特”系藏语“ནམ་མཁའ་”之音译，意为“传奇故事”，系安多藏区兴起的藏戏剧种流派，发祥于甘肃拉卜楞寺。该剧种除改编卫藏地区藏戏传统剧本外，还自创有大量剧目，注重戏剧故事情节的传奇色彩。

② 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南文史资料》（第6辑），甘南报社1989年版，第145页。

③ 这一版本的罗摩故事情节为：冉玛拉王子与美丽的悉多结婚，王子带悉多和弟弟罗什曼那到深山密林中修行，罗刹王得知悉多是个绝世美人，心生歹念，变化为一个怪物前去骚扰。王子专心驱逐怪物，到傍晚还没回来，悉多让罗什曼那去寻找，罗刹王乘机变幻成一乞丐前来行乞，又施展魔法劫走悉多。王子兄弟回到山洞，发现悉多不见踪影，四处寻找。途中遇见两只猴子正在搏斗，王子诉说了妻子失踪的情况，一只猴子答应只要帮他打败对方他就可以帮助寻找悉多。于是王子用箭射死对手，猴子带他来到猴国，让聪明勇敢的哈努曼寻找悉多。哈努曼得知悉多在罗刹国，偷偷潜入罗刹花园与悉多联络，又故意被罗刹捉住，设法让罗刹王点燃了他的尾巴。他在罗刹宫殿奔跑，将宫殿烧得一塌糊涂，最后在水缸中熄灭了火焰。哈努曼向王子报告，王子率领大军讨伐罗刹城，哈努曼与罗刹王决斗，机智的王子用箭射掉了罗刹王肩膀上十个脑袋，罗刹王一命呜呼。王子与悉多相会，胜利返回王宫。参见刘志群：《中国藏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胜利，是摒弃两端秉持中观，拥有无我之上智慧的象征”。^①此外，罗摩拼尽全力追逐动物都无法捕获，筋疲力尽，表明诸法自性皆空，不能只了解表面而被贪恋之心迷惑；罗摩以箭射中罗刹王马头，暗喻中观洞见斩断我执，领悟空性。

该剧本于1962年首次在拉卜楞寺上演并获得强烈反响，随即成为该寺重大宗教节日的必备表演剧目之一，推动了《罗摩衍那》在藏区的传播与接受。不久后，同教派名寺隆务寺^②派人专程前来学习借鉴并成功演出，凭借自身宗教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了罗摩故事在藏族民间的传播范围。同时，印度教故事的佛教化、文学与戏剧的学科交叉属性也无不彰显出《罗摩衍那》在藏区深入人心的传播状况。

2. 山南藏戏《若玛囊》

作为山南地区乃东藏戏班所演出的自创剧目，蓝面具藏戏《若玛囊》由20世纪山南地方一位秘书摘录自藏文史籍记载的罗摩故事，后经创作改编而成。具体情节如下：十首罗刹王生得一女，看相人认为不详，于是罗刹王将女儿置于铜盒中弃于河中随河流漂走，被农家夫妇救起抚养，取名为“冉念玛”（རྩལ་རྩེད་མ།，渠获女）。十车王之子若玛囊前往森林修行，偶遇美貌的冉念玛，心生爱慕，忘却修行，迎娶为妃。罗刹王得知后，派大臣玛茹孜变为野兽诱骗，若玛囊追捕中冉念玛被劫。若玛囊帮助猴王获得王位，猴王派神猴哈努曼寻找冉念玛。若玛囊率领大军与罗刹王激战，获得胜利后与冉念玛重逢，但又怀疑其贞洁，并将其遗弃。哈努曼说明内情，二人再度团圆。^③从罗刹王生育和抛弃悉多、农夫抚育并献给罗摩、罗摩质疑悉多贞洁并遗弃悉多、哈努曼陈述实情夫妻和好如初的情节内容判断，此剧本与敦煌古译本的部分内容相一致，但情节少于古译本且较为简略，因此该剧作可能是参照与古译本高度相仿的某一版本改编而成。^④目前乃东藏戏班收藏有该剧本。

3. 康定木雅藏戏《国王冉马拉》

作为康巴藏戏五大流派^⑤之一，木雅藏戏是四川康定木雅地区演出的藏戏剧

^① 仁欠卓玛：《藏族传统戏剧体〈罗摩衍那〉分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33期，第160页。

^② 隆务寺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隆务镇，系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其规模、地位和影响在安多藏区仅次于甘肃省的拉卜楞寺和青海省的塔尔寺。

^③ 《中国戏曲志》（西藏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西藏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④ 不少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前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寺珍藏有一本梵文本《罗摩衍那》，这可能与山南藏戏《若玛囊》存在某种联系。但对于该梵文本的具体细节及现状，学界大多语焉不详。参见降边嘉措：《〈罗摩衍那〉在我国藏族地区的流传及其对藏族文化的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第71页。

^⑤ 康巴藏戏主要分为巴塘藏戏、道孚藏戏、理塘藏戏、康定木雅藏戏和甘孜藏戏五大流派，主要使用藏语康巴方言，整体风格刚健豪迈。

种，由20世纪初康定居里寺一世活佛格桑云登将巴塘藏戏与当地民间山歌唱腔融合后创建而成。木雅藏戏编演剧目主要来源于卫藏地区的传统“八大藏戏”，而《国王再玛拉》是1909年格桑云登依据藏译罗摩故事文本，以木雅语和木雅山歌唱腔自创的藏戏剧目，独具当地民俗特色。

综上所述，我国三大藏区不同流派的藏戏剧团都因地制宜地创写编排了具有地域特色与派别特征的罗摩故事戏剧。蓝面具藏戏乃东戏班、安多藏戏拉卜楞寺戏班和康巴藏戏木雅戏班都根据藏译罗摩故事编创了《罗摩衍那》剧目，实现了罗摩故事与戏剧艺术形式的全新结合，但不同版本情节内容存在明显差异。可以发现，藏戏剧本《罗摩衍那》都是根据文学脚本改编而成，需要经过各地戏班创作为戏剧演员的说唱本才能演出，既有文学资源与多种藏戏唱腔风格的整合成就了复杂多样的罗摩故事样态。罗摩故事通过生动活泼的藏戏舞台表演完整地呈现给广大藏族民众，深入藏族民间叙事土壤。即使是目不识丁的观众，观赏后也能记忆犹新，深受感染。因此，20世纪《罗摩衍那》作为经典题材成功结合戏剧表演已深刻融入藏族民间，藏戏丰富多样的种类形态阐释出截然不同的罗摩故事。

（三）《罗摩衍那》的现代释读

《罗摩衍那》以华美优雅的创作风格奠定了不可撼动的经典文学地位，但其高深艰涩的语言风格也使读者望而生畏。此前，安多藏区拉卜楞寺学者谢雄·阿旺丹白嘉措根据叙事诗创作了诗歌注疏本《罗摩衍那释义》，全名为《罗摩衍那传释洁净晶石礼》，堪称最经典的释义版本。1981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辑录出版，合名《罗摩衍那》（藏文版）。

青海师范大学堪本所著《罗摩衍那传释》（1997）是继谢雄·阿旺丹白嘉措后最具代表性的注释版本，深受藏族读者喜爱。该版本以端智嘉讲习《罗摩衍那》的音频资料为依据，主要解析诗文意义并分析所用修饰法，语言通俗易懂，更易于读者理解诗文原意。

目前已出版的同类释义注本还包括扎巴《罗摩衍那赏析》（2018）和道吉才让《〈罗摩衍那传〉释义》（2019），都是对象氏《罗摩衍那》诗体原文的注解释读，因此故事情节完全一致，但在细节注释和认知理解上有所差异。此类释义本通常按照一诗一注的方式编写，注释内容包括：校正勘误、解释诗文、辨析修饰法以及阐明诗歌辞藻和引用的印度神话故事等。其中《〈罗摩衍那传〉释义》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注释内容分为疑难术语解释、意义阐发和修饰方法专释三大板块，可谓当代罗摩故事注本的集大成者。象氏《罗摩衍那》作为严格参照《诗镜》创作理论的诗作精品，在藏族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已成为

历代藏族学者修习《诗镜》之必读书目。不过，由于该版本过于注重形式之美，语言较为晦涩艰深，对于普通学习者难度较大，因此撰写象氏《罗摩衍那》诗歌注解也成为一种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藏族文学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四）藏族文学史中的《罗摩衍那》评述

《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情况还大量反映在当代藏族学者编写的各类藏族史文学教材中，这类评述资料成为必不可少的藏族文学经典叙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收录《罗摩衍那》相关论述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代表性藏族文学教材有：郭须·扎巴军乃的《古代藏语教程》、拉加才让的《藏族文学史》（藏文）、马学良与恰白·次旦平措主编的《藏族文学史》、南仙才让和恰嘎·多杰才让编著的《藏族文学史（4）》（藏文版）、扎布的《藏族文学史》（藏文）等。以上文学史教材多由藏族学者参与选材与编写，体现出当代藏族学者对罗摩故事题材的认知与接受，也彰显出罗摩故事在藏族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文学经典往往是经过漫长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并参与构建主流文学话语体系的代表性文学作品，具备重要意义。从审美心理看，文学经典已成为民族历史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经典化进程中吸纳优秀文化基因，蕴含着民族精神与文化理念。作为藏族文学经典的罗摩题材系列故事是在《罗摩衍那》跨界传播基础上形成的藏族文学文本，《罗摩衍那》与藏族罗摩故事虽为源流关系，但在藏族文学史层面上却具有根本差异与区别。藏族文学史以藏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的规律与特征为研究对象，所收入的罗摩故事主要是藏族民众接受和吸收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后创造的新质文学作品，探讨的是富于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的文学叙事现象。综上，少数民族文学史的选材、编写与辑录进一步巩固了罗摩故事题材在藏族文学史上的经典化地位。

三、20世纪以来《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的特征

（一）传播路径的多元性生成

长期以来，《罗摩衍那》主要借助宗教传播渠道传入中国藏区。《罗摩衍那》在世界范围内主要以政治交流、贸易往来、宗教传播等多种渠道流传各地。有学者将其传播路线具体划分为西线、北线、东线、东南线和南线五条线路，其中北线是“从东部经北部的旁遮普邦、克什米尔地区进入中国各地，包括西藏地区、汉族地区、蒙古族地区和新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再经中国传入日本”。^①北线路径囊括了《罗摩衍那》在中国藏区的传播轨迹。吐蕃王朝时期贵族王室积极

^① 张玉安、裴晓睿：《印度的罗摩故事与东南亚文学》，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引入佛教文化，大兴佛法，从印度、尼泊尔和国内中原等地区延请高僧大德和译师，修建佛寺，广译佛经，促进了中印、中尼以及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敦煌古藏文译本是在吐蕃占领敦煌后大兴佛事、组织译经讲经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佛教文献中的罗摩故事也是伴随译经事业的发展进入到我国藏族地区。

从目前可考证的文献类别看，20世纪前中国藏区接受《罗摩衍那》的文本类型主要分为印度教与佛教两大宗教版本，即通过佛教传播接受了印度教与佛教讲述的不同版本罗摩故事。这与印度本土激烈的教派竞争联系紧密。古代印度国内宗教盛行、诸派林立，各个教派为宣传教义、吸引信众、扩大宗教影响而积极从民间文学汲取素材，增添宗教成分，演绎成蕴含宗教义理的传说故事，这其中就包括罗摩故事。尽管中国藏族地区信奉藏传佛教，但佛经文学中的罗摩故事并不完整全面，往往呈现为某一片段、人物、地名或某个情节母题，这是因为佛教徒改良罗摩故事时往往截取片段叙述，作为论证阐明佛理奥义的引例。相比于佛教，印度教的罗摩故事版本显得结构丰满、规模宏大。例如，赞颂类佛经《胜天赞》《殊胜赞》主要讲述王宫斗争部分，故事较为简练，而康珠·丹增曲吉尼玛所著《诗镜注释妙音戏海》中讲述的印度教《毗湿奴十化身故事》之罗摩化身的情节相对完整，说明同一故事也存在宗派差异，佛教徒也会注意辨别印度教的罗摩故事。

20世纪以降，《罗摩衍那》传入藏区不再依靠宗教传播，而是以根敦群培为代表的现代藏族学者戮力齐心的译介与阐释，开启了《罗摩衍那》全新的藏译事业。吐蕃时期，中国藏区与印度文化交流密切，宗教传播长期成为《罗摩衍那》藏译传播的重要渠道。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往往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即不同教派间存在的排斥和贬低倾向。因此，宗教传播渠道不仅限制了藏族民众欣赏异国史诗文学的能力，也成为跨文化传播过滤和变异现象生成的重要成因。

20世纪初，藏族传统社会开始受到以科学与理性为主导的现代化思潮的强烈冲击，封建农奴制度统摄下根深蒂固的旧有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动摇。藏族学者根敦群培率先垂范，游学南亚，以现代性人文史观开创了藏学研究的全新局面，打破了长期束缚藏族学者的封建神学观念，精通梵文、巴利文和英文等多种语言的他以平等对话的文化姿态从事文学翻译与研究。他不仅高度还原了《罗摩衍那》史诗原貌，同时辅以实地考察与调研，对《罗摩衍那》的文学翻译与学术研究在藏译传播与接受史上堪称创举。此后，众多藏族学者秉承了根敦群培开创的人文史观学术传统，以唯物史观展开了对《罗摩衍那》的翻译与研究事业。《罗摩衍那》藏译的现代传播已突破了宗教壁垒，呈现出多元文化平等对话、共生共荣、互阐互释的全新格局。藏族学者不再对《罗摩衍那》冠以“外道传说”的贬称，

而将其看作研究印度历史、政治、宗教、文化、民俗的经典文献以及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二）译介主体的现代性转变

纵观《罗摩衍那》的藏译接受史，其译介主体即藏译学者经历了包括译介动机、身份意识、能力素养等多种层面的变化。吐蕃王朝时期，藏族地区迎请大量尊者译师，同时派遣优秀僧侣前往印度学法取经。这些以宗教交流为使命的中印文化交流“使者”在《罗摩衍那》藏译史上长期发挥着重要媒介作用。他们以翻译佛经、弘扬佛法为己任，在引进、翻译、介绍印度佛教过程中将《罗摩衍那》译介过来。随着译经事业不断深入和译场制度日臻完善，佛经译师在大量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翻译规律与经验，编纂了大量诸如《语合二要》《翻译名义大集》等具有开创性的翻译理论典籍和对照辞典，藏族译师队伍不断壮大，佛经翻译逐渐走向规范系统化。

然而，自吐蕃时期佛苯之争伊始，宗教矛盾长期成为藏族地方社会政治纷争和战乱的导火索和催化剂。这与佛教僧侣的自我身份意识密不可分。《罗摩衍那》伴随佛教传播进入藏区，译者以藏族译师为主，这就决定了译者主体对印度教故事《罗摩衍那》的警惕心理和排斥倾向。最典型的是，象雄·曲旺扎巴实际是以一种讽刺戏谑的态度完成了对罗摩故事的改编与创作。他在叙事诗《罗摩衍那》中指出，这部史诗作为“外道的古老传说，内容多有杜撰，蚁蹶仙人根据婆罗多故事创作罗摩故事，后世传承如盲人交流一般，完全无法确定细节”

(དོན་མང་བྱ་བས་གོས་པའི་འགྲོ་བཤམ་ འཕྲོར་བ་འདི་དག་གླ་ར་ཉའི། འཕར་བ་ལ་བརྟེན་གྱིས་མཁར་གྱི། རྗེས་འབྲང་མོང་བ་བརྒྱུད་པ་ཉིད།) ,^① 以此表达对罗摩故事的谨慎心理。从吐蕃时期到19世纪末，《罗摩衍那》在藏区的境遇与接受很大程度受到佛教僧侣学者宗教思想观念的影响。尽管不少藏族僧侣精通梵文，通晓佛理，佛学造诣深厚，翻译素养很高，但对异国异教的传说故事心存戒备。他们为弘扬佛法翻译浩如烟海的印度佛经，引进了印度本土流传诸多版本的罗摩故事，但是却对这一外来文化产品持谨慎态度。有学者指出，20世纪前，印度除佛教外其他宗教的文学经典“很少被完整翻译到中国来，即使部分片段保留在佛经而一定程度流传到中国，但往往被涂抹上浓厚的佛教色彩，原有的宗教特征并不明显”，^② 这一结论也基本可概括《罗摩衍那》在藏区的传播规律。

《新译罗摩衍那》是藏族学者开始体现出文化自觉意识，走向现代人文主义的一次创造性尝试。旅居南亚各国12年的人生阅历为根敦群培的学术研究提供了

^① 象雄·曲旺扎巴：《罗摩衍那》（藏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② 方汉文主编：《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丰富翔实的一手文献资料。在周游诸国时，他四处考察，笔耕不辍，著有大量论述及翻译作品，开创了富有藏族特色与时代气息的全新藏学研究方法。以《罗摩衍那》为例，根敦群培饱读经书，在国内学经时期已对罗摩故事熟稔于心。旅居印度期间，他走访印度各地，结合藏族经典论著中的历史论述进行考察，完成了“对旧知识的重新体认和对新知识的接受与传播”，体现出“理性与批判的现代写作精神”。^①他的旅行札记多次提及《罗摩衍那》中的城邦阿逾陀以及英雄罗摩。^②可以发现，根敦群培在熟读《罗摩衍那》情节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以实地考察，以个人知识视野加以验证，批判地继承了藏族前辈学者的著述经验。

《新译罗摩衍那》基于译者本身丰富的知识阅历和人生体验，彰显出藏族社会现代性初现端倪的历史面貌和藏族传统学者初步建立的现代性身份意识。精通梵文的根敦群培积极搜集印度当地文学作品，将大量印度经典译为藏文，为中印文学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新译本是《罗摩衍那》藏译接受史上首个较为接近当今梵文精校本的藏文译本，二者在谋篇布局和章节划分上相差甚微。此前《罗摩衍那》若干藏文本体现出明显的佛教化改造痕迹，这是由《罗摩衍那》传入藏区文本的印度教属性所决定的。此外，这些藏文本所参照的原本也较为古老，导致罗摩故事的完整面貌在藏区传播中的失真与变形。根敦群培游历印度时所接触的梵文本《罗摩衍那》成为规模宏大的史诗巨著，这对他译介新译本至关重要。他不仅详细翻译了完整情节，而且结合知识背景详细介绍了许多印度神话传说，如十车王王室谱系、梵天创造世界等。可见，根敦群培对翻译文学作品的学术态度与先辈学者已截然不同。将史诗完整风貌的忠实还原程度作为划分标准，新译本与以往的藏译罗摩故事存在着本质差异，这种嬗变可视为当时藏族学者现代意识初步确立、理性写作范式初步建立的文学表征。

（三）接受主体的学理性研究

在《罗摩衍那》藏译传播中，藏族学者扮演了译介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双重历史角色，而在文本旅行与阅读行为中，文学接受主体的观念突变往往会带来全新的阐释空间与解读方式，甚至引发新的文学思潮。这种传播效应集中体现为藏族学者从援引改写 to 实证阐发的研究范式转变，即学理层面的批判式思维与创新

^① 增宝当周：《根敦群培的域外行游与异域书写——以〈智游佛国漫记〉为中心》，《西藏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7页。

^② 例如，“萨惹约河南岸就是阿逾陀，这是无战之城罗摩王的诞生地”“自阿拉哈瓦达购十二安纳火车票可到阿逾陀，那里便是罗摩王的诞生地”等，参见根敦群培：《根敦群培文论精选》，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160页。

意识。20世纪初，随着现代科学思潮涌入中国藏区，文化视阈的融合催生出认知观念的裂变与新生，《罗摩衍那》藏译学者的主体意识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转变，在学术观念方面与传统藏族学者呈现出本质差异与分野，学理性与客观性显著提升。以根敦群培为代表的藏族学者开始摒弃宗教成见，跨越宗教藩篱与文化隔阂，以宏阔的全球化视野、敏锐的文化嗅觉、开放包容的文化姿态对《罗摩衍那》展开深入探讨与研究。此后，《罗摩衍那》在藏区的译介、传播与接受情况都呈现出全新的文学格局。根敦群培首先以现代人文史观翻译出《新译罗摩衍那》，并辅以实证性田野调查资料，开《罗摩衍那》现代翻译与研究之先河。此后，藏族僧侣积极将《罗摩衍那》改编为藏戏剧本，在各大宗教节日隆重上演，藏族群众开始接触到生动具体、绘声绘色的罗摩故事。

印度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问世后，季羨林将梵文本翻译为汉文本并著有大量研究论述，《罗摩衍那》在中国受到了空前关注。藏族学者端智嘉不仅以散文和诗歌形式重译《罗摩衍那》，还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了深入阐发。此外，藏族学者放见以季羨林汉译本和梵文精校本为参照，翻译出首个藏文全译本《罗摩衍那》，译文内容与汉译本几乎无异，完全还原了宣扬印度教教义的梵文原本。

21世纪以来，藏族学者不仅关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及其传播过程中衍生的藏族罗摩故事，而且体现出对《罗摩衍那》藏译传播历程与文化过滤机制的浓厚研究兴趣。他们并不满足于利用谱系学和版本学研究方法对众多罗摩故事进行文本溯源与知识考古，而开始尝试基于跨学科整合视野研究《罗摩衍那》，探索史诗文本在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视域下的流传与变异问题，源文本与译本间译介下的创造性反叛问题，史诗不同译本间的差异及文化渊源问题。这种研究视角往往将《罗摩衍那》看作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生产的文学表征符号，其文学翻译实践则成为异质文化场域下的文本旅行活动，穿梭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本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变异现象。同时，他们也开始关注《罗摩衍那》与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具体文学关系，探讨两部英雄史诗的审美共性与文化差异。^①全新的研究视域、方法和材料为当代藏族学者研究《罗摩衍那》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阐释空间与解读可能。总的来看，此类研究成果具备浓厚的学理性与思辨性，体现出藏

^① 以西藏大学藏族学者多布旦和仁欠卓玛为例，除了关注具体版本的藏族罗摩故事以外，他们还从综合比较的宏观视角对此进行了深度开掘，如多布旦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藏文文献价值与研究综述》、仁欠卓玛的《探析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藏族传统文学中的价值》，多布旦和仁欠卓玛的《〈罗摩衍那〉不同版本的文化探析》以及《环喜马拉雅史诗比较研究现状与问题分析——以〈格萨尔〉〈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为中心》等。这些学术成果或将藏族罗摩故事视为印度史诗文学与藏族文化传统有机融合的产物，以此回溯中印悠久的文学与文化交流史，或借助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探索《罗摩衍那》和其他英雄史诗的复杂关系。

族学者在《罗摩衍那》研究领域中独到的学术眼光与敏锐的学术思维。

由此可见，20世纪是《罗摩衍那》在中国藏区接受境遇的重要历史分界线。此前，藏族僧侣学者普遍运用罗摩故事进行文学创作，但其研究评析领域几乎无人涉足。此后，《罗摩衍那》的文学经典地位得到确立，外国风情与本土传统结合产生的全新文本为藏族学者所熟知，遍及藏族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三大分支，呈现出系统全面的文学接受景观。藏族学者明显表现出学理层面的哲思省辨与探索意识，如根敦群培游历印度对于罗摩故事见闻的记录，新译本对史诗历史真实性的精辟见解，端智嘉对《罗摩衍那》的翻译、创作和研究，藏族学者竞相为学习讲授叙事诗《罗摩衍那》撰写注疏，各大版本的藏族文学史对《罗摩衍那》若干藏译本的梳理和介绍等。

藏族文学变迁与藏族学术研究思想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藏学以“叙述、阐释、注疏为主要方法，以佛学理论为指导思想，撰著者多为高僧大德，突出特征是佛教神学史观和阐释注疏方法”，^①这种富于藏族特色和佛学色彩的寺院精英教育体制和治学模式延续千年，对藏族学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范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世纪后，藏学开始打破文史哲不分家的历史局面，开始走向现代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与范式。有学者指出，藏族学者的学术史观经历了“佛教神学史观——人文史观——唯物史观”^②三大发展阶段，而新译本的诞生正处于人文史观学术传统初步开创的历史坐标中。译介主体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译本的忠实程度与文学风格。《罗摩衍那》藏译学者经历了从佛教神学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观念转变以及佛教僧侣阶层到现代学者的身份转变，这种历史变迁深刻影响着《罗摩衍那》文本到达传播终点的真实情况。

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藏族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宗教信仰为价值导向的传统宗教社会，宗教偏见和教派斗争根深蒂固”，^③表现为佛教与其他宗教间的隔阂和藏传佛教诸教派的内部纷争。传统学者大多属于藏传佛教各教派僧侣阶层，对于“外道”传说多有戒备之心，因此《罗摩衍那》相关译本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佛教化倾向，其中的印度教成分都被改写甚至删减。而20世纪初的藏族学者在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中都体现出现代化身份意识与文化观念，即打破宗教门户偏见，冲破佛教神学思维桎梏，以开放包容、平等尊重的文化多元视角审视藏族传统文化，以朴素的人文史观进行学术实践。新译本反映出根敦群培的宗教平等观念以及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这在当时的藏族地方社会可谓开天辟地。他主张佛教与

① 杜永彬：《更敦群培——西藏的人文主义先驱》，《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5页。

② 同上，第74页。

③ 李佳东智：《试论根敦群培的宗教宽容思想》，《中国藏学》，2013年第3期，第87页。

其他宗教平等交流，真实还原出印度教圣典《罗摩衍那》的整体面貌，抛弃束缚传统藏族学者的宗教藩篱，尝试将文学交流从宗教思维定式的禁锢中剥离出来，从文学审美角度呈现《罗摩衍那》的艺术魅力，这种主张平等对话、开放交流的文化姿态在当下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四、结语

20世纪以来，《罗摩衍那》藏译和接受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多元化态势，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藏族学者开始将《罗摩衍那》的文学翻译与评论研究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涌现出众多生动流畅的译作与鞭辟入里的评述资料，这与20世纪初藏族学者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变紧密相连。另一方面，罗摩故事开始跨越文学疆界与藏戏表演艺术紧密结合，从藏族精英学者的经典著述走向藏族民间艺术，成为藏族民众津津乐道的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综上，《罗摩衍那》经过藏族学者不遗余力的译介和创造性工作已与藏族思想文化传统有机融合，并通过本土化改造实现了文本的经典建构。

[责任编辑：李丽]